

第 17 卷 第 3 期 2024 年 11 月

(本期选译自美国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17, Winter 2024)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7 卷第 3 期 2024 年 11 月

Vol. 17, No. 3, November, 2024

国际高等教育

2023 年诺贝尔奖：对高等教育的意义	1
赞扬高等教育中的渐进式创新	4
重新思考对高等教育的国际援助流动	6
出版商、引文索引与不平等的全球科研经济	9
美国招生中的种族问题：它未曾结束，除非我们放手让它消失	12
法国：平等机会与择优录取	15
南非大学基于种族招生的复杂性	18
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平权行动	21
巴西高等教育中的平权行动	24
我们还能阻止国际化的终结吗？	27
全球学生流动处于十字路口：数据为何重要？	30
技能应解决什么问题？	32
重思欧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34
连接与合作：全球高等教育研究的连接与合作	37
高等教育研究与现实：需要更好的结合	40
黯淡但不无希望：在多重危机中的黎巴嫩高等教育	43
日本：如何应对人口下降	45
东亚高等教育：当前与未来的挑战	47

2023 年诺贝尔奖：对高等教育的意义

菲利普·G·阿特巴赫、特莎·德拉奎尔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特莎·德拉奎尔 (Tessa DeLaquil)：丹麦奥胡斯大学 (Aarhus University) 丹麦教育学院 (the 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tdel@edu.au.dk

2023 年诺贝尔科学奖的主要启示是什么？有几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明确启示与教训。虽然世界一直特别期待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科学领域的崛起，但 2023 年的诺贝尔奖没有表现出这种多样化特点。九位获奖者中有八位来自西方大学，其中六位来自美国。第九位，化学奖的共同获得者阿列克谢·埃基莫夫 (Alexei Ekimov) 是纽约一家私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与往年相似，获奖者多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似乎对东欧国家而言是丰收之年，其中两位在匈牙利接受教育，另一位则在前苏联国家受教育。大多数获奖者在其职业生涯中曾在多个国家的机构工作过，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德国、匈牙利、荷兰、俄罗斯、韩国、瑞典和美国——这再次证明了科学领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特征，尽管它倾向于集中在一个典型的富裕西方国家集群中。

耐人寻味的是，今年的获奖者之一卡塔林·卡里科 (Katalin Karikó) 的职业生涯揭示了性别歧视对科研领域的显著影响，并凸显了从事非主流思想研究以追求诺贝尔奖级别成就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科学依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特征

尽管 2023 年诺贝尔奖获奖者中多数来自美国，但他们的科研与学术职业生涯却展现出与近年来趋势相符的国际化特征。这些获奖者分别出生于五个不同的国家——其中三位来自美国，两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匈牙利，一位来自突尼斯，以及一位出生于前苏联国家。他们分别在四个国家获得学士学位，并在五个不同的国家获得博士学位。

不出所料，这个杰出的科学家群体在职业生涯中展现出高度的国际流动性，他们曾在至少 10 个国家担任过学术和科研职位，并在这些岗位上表现活跃。其中，九位获奖者中有四位曾在法国接受教育或开展职业生涯，五位曾在德国工作，这些职位涵盖了大学、研究所及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横跨学术和工业领域。然而，美国依然是这一群体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关联国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九位获奖者中有八位的职业轨迹都与美国有着显著联系。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

2023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群体中，非西方

世界似乎在其职业生涯中较为缺席——在他们的成就履历中，鲜少提及与除西方国家外其他地区的机构建立的任何紧密关系，如博士后研究、访问教授职位或其他形式的合作等。唯一显著的例外是一位获奖者曾在韩国的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这一经历成为了他与非西方世界联系的一个亮点。

2023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现出与欧洲大陆的多样化关系和具有丰富经验的特点。其中，德国、瑞典和匈牙利在三位获奖者的当前隶属关系中尤为突出，法国和德国作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热门目的地，吸引了众多获奖者的青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这一届中完全缺席，这或许是一个令人稍感意外的现象。

美国在诺贝尔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非新鲜事，但今年尤为突出。美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 28%（中国以 22% 位居第二，尽管今年并未有诺贝尔获奖者）。美国顶尖大学中的研究教授，尤其在 STEM 领域，享有世界上最高的学术薪酬，并能获得进行顶尖研究所需的资源与自主权。

美国的科学和大学能否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仍存疑问。美国学术界面临的内部压力，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科研能力的显著提升，可能会促使未来的全球科学界更加均衡。然而，目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依然占据全球科学的顶端，这在诺贝尔奖及其获奖者的分布上有所体现。

卡塔林·卡里科的案例

卡里科博士是生理学/医学奖的共同获得者，在媒体上引发了很多评论。她出生于匈牙利，并在匈牙利接受教育，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也曾三个国家的多个

机构任职，最近的一次任职是在德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争议源自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任职经历，她于 1989 年至 2001 年在该校工作，期间担任的职位包括科研助理教授、高级研究主管，以及兼职副教授。在此期间，她于 1995 年从一个终身职位被降职，失去了再次获得终身职位的可能性，最终在 2013 年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她的密切合作伙伴以及诺贝尔奖共同得主德鲁·魏斯曼博士（Drew Weissman）于 1997 年与她相识，目前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医学教授，同时也是宾大艾滋病研究中心免疫学核心的联合主任，以及传染病部门疫苗研究主任。

有人指出，卡里科在探索高风险或非传统的研究课题时，面临常规资助机构和资深学者难以识别其研究潜力的挑战。直到她与同事魏斯曼共同获得多个奖项后，她的研究价值才逐渐被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在匈牙利塞格德大学（Szeged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而非某个主要国家的顶尖学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早期获得广泛认可的机会。此外，有观点认为这是性别歧视的一个明显例证，因为尽管宾夕法尼亚大学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自豪地宣扬了卡里科的诺贝尔奖成就，但其早期未能充分重视她的研究工作。

她的职业生涯比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主要艰难得多，这表明科学界至少应该重新审视如何评估创新且具探索性的科学想法，并为这类开创性的基础研究保留资金和支持。当然，性别歧视在学术界和其他地方仍然普遍存在，亟待消除。

基础科学不仅限于传统学术界

今年的所有获奖者都曾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过。三位化学奖得主目前都有其学术隶属关系，但其中两位曾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过，第三位阿列克谢·埃基莫夫（Alexei Ekimov）在纳米晶体技术公司（Nanocrystals Technology），这些机构都在美国。卡里科搬到德国的 BioNTech 继续她未被学术界支持的研究。一些人在研究所工作过，有些是国家资助的，有些是独立支持的非营利组织。这些机构既包括国家资助的顶级科研机构如德国的马克斯·玻恩研究所（Max Born Institute）、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及劳工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也涵盖独立运营的非营利组织。他们的足迹还遍布了匈牙利科学院的分子指纹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lecular Fingerprinting Research）和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er）、荷兰的基础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Matter）、前苏联时期著名的瓦维洛夫国家光学研究所（Vavilov State Optical Institute），以及美国的多所国家级实验室，如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结语

诺贝尔奖当然是颁发给通常在几十年前取得的科学成就，尽管各个评奖委员会强调了这些工作在当代的相关性。诺贝尔奖试图将基础研究与应用和实际成果联系起来——这些想法和创新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逐渐成熟。但它们提醒我们，基础研究是科学的基石，不仅对理解科学本质至关重要，同时也对实际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诺贝尔奖表明，科研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基于功绩（并希望具有创造力）分配的资金是核心。尽管如此，卡里科的案例揭示了制度化科研系统中的歧视现实（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以及那些未得到支持的科学家为追求这种高水平研究所采取的替代路径。尊重学术自由、鼓励独立工作与同事合作、拥有充足资金并在学术治理上享有自主权的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是开展卓越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的必要场所。如果学术界无法成为这种研究的家园，研究人员可能会被吸引到那些能够提供居所的非大学机构。

赞扬高等教育中的渐进式创新

卡洛斯·伊万·莫雷诺

卡洛斯·伊万·莫雷诺 (Carlos Iván Moreno)：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

(University of Guadalajara) 教授

电子邮件：ivan.moreno@academicos.udg.mx

几个月前，一位小型创新型大学的校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声称：“仅仅创新已经不足以让大学生存下去了，它们的创新必须具备颠覆性 (disruptive)。”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高等教育会议上，颠覆性创新的热潮占据了主导地位。听起来不错，但这真的可行吗？传统的、渐进式创新究竟有什么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新成为高等教育的口头禅。学者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强调，如果没有创新，大学将无法满足质量和公平的要求。创新和质量是密不可分的概念，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的大学面临变革和适应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教学方法、交付模式和灵活性的创新对于应对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学生需求和期望变化带来的剧烈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中，渐进式创新不够好吗？

随着大学需要培养拥有多元化目标和需求的人才，它们面临适应和变革的压力显著加剧。除了过去迫使大学创新的挑战之外，新兴力量也在出现，并且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会深远。其中之一是在线教育提供商、短期课程和微证书（基于能力的认证，展示在特定领域的精通）日益普及。与传统和正式的高等教育课程相比，它们能够在更短的时

间内，为学习者和潜在员工提供特定领域的丰富知识。

例如，从 2011 年到 2021 年，全球参加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 的学生数量从 30 万增长到 2.2 亿。在墨西哥，目前有 570 万学习者在 Coursera 上注册了在线课程；这超过了高等教育的正式注册人数（约 500 万）。这些证据表明电子学习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但更重要的是，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需要演变以提供更灵活的学习体验。

自动化对未来就业的影响也加剧了大学面临的压力。据估计，30%至 60%的专业活动可以实现自动化，并且目前 12 岁及以下的人口中有 65%将在未来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工作。大学，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将需要开设新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为学生提供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机会。课程创新将需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城市科学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相关项目。

此外，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格局将需要对传统讲座进行教学转型。正如美洲开发银行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指出的那样，该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意识到“混合式”与在线学习对于未来至关重要。根据这项研究，高达 80%的教职员工同意，高等教育中采用混合学习模式是不可逆的。学生们也有类似看法：只有 2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教育项目

应该完全或主要以面对面形式授课。此外，高等教育中的创新需要反映跨学科的方法以及实践应用。

我认为，应该通过传统和渐进式的创新方法，而不是内部组织颠覆的叙述，来应对这些外部的颠覆性力量以及其他类似的外部挑战。

要创新，不要破坏

如果说过去大学秉持的是创新的信条，那么如今它们似乎正生活在颠覆的压力之下。为应对上述一些挑战，传统大学需要继续以渐进和谨慎的方式进行创新，而不是被颠覆性的潮流所左右。为了清晰表达并正确使用语言，我们不妨记住，创新（innovation）是指“新的事物，或对现有产品、理念或领域的改变”（来自《韦氏词典》），而颠覆性则意为“引起麻烦，从而阻止某事按常规继续”或“倾向于破坏有序控制”（来自《剑桥词典》）。

无论大学的使命、规模或其体制模式如何，人口、社会和技术力量都对大学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它们“改进产品和理念”，进行创新。然而，大学在试图通过颠覆来“破坏有序的控制”时，应该非常谨慎。尽管我们赞美变革，但我们也需要重视大学的稳定性。有一个严峻且显而易见的真相：没有组织稳定性，大学无法进行创新，更谈不上颠覆。

背景和规模很重要。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这样的机构，拥有 37.3 万名学生和 4.2 万名教职员，或瓜达拉哈拉大学

（University of Guadalajara）拥有 32.9 万名学生和大约 1.8 万名教职员，以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大型大学，都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一种复杂的平衡。它们若要颠覆性变革，可能会破坏其内部治理的稳定。因此，大型大学必须逐步进行创新，通过一系列小而优先是结构性的改进，以及在教学方法、教育传递模式和组织结构上的非颠覆性变革来推动进步。

与颠覆性创新不同，渐进式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提升效率和效果，同时保持稳定性。毫无疑问，持续的创新对于大学的长期相关性至关重要，但声称“成功”完全取决于它们的颠覆能力是具有误导性的。渐进式创新不仅有益，甚至可能是成熟大学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

保持怀疑态度

大学管理者和“管理大师”都应接受渐进式创新，特别是在引导机构走向正确方向时。作为高等教育学者，我们应对那些认为改善大学的唯一方式是颠覆的人持怀疑态度。不要忘记，尽管 MOOC 提供商从事的是培训业务，大学则是提供全面教育的机构，并且已经这样做了上千年。

我同意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观点，他警告说，不要轻易呼吁高等教育的快速变革，因为“并非所有大学所做的事情都需要改变”，也不必快速适应最新的生产力潮流。为了改善高等教育，重要的是要打破颠覆叙事的神话。

重新思考对高等教育的国际援助流动

李·伦西默、特里斯坦·麦考恩

李·伦西默 (Lee Rensime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L.rensimer@ucl.ac.uk

特里斯坦·麦考恩 (Tristan McCowan)：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国际教育系教授

电子邮件：t.mccowan@ucl.ac.uk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持续的全球挑战方面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与基础教育不同，大学具有广泛的职能：教学和学习、基础研究、创新和社区参与，此外还提供其他服务，如医院、职业培训和咨询，提供一系列公益与私人物品，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然而，大多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尤其是在结构调整协议的背景下，且难以留住博士人才，这阻碍了高等教育多样化职能的实现。

虽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过去二十年多边机构的不断讨论中得到了体现，但来自这些机构和双边援助方的高等教育资金自 2002 年以来占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总额的比例有所下降，尽管绝对援助金额有所增加。这些援助的主要部分也流向了拥有发达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而非基础设施最脆弱的国家，并且援助的分配也广泛倾向于个人层面，如国际奖学金和培训，而非直接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鉴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显著，且与基础教育援助的广泛研究相比，关于高等教育援助的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却出奇地有限。现有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援助的稀缺文献，主要提供了对特定项目的深入分析、对国际组织作用的批判性审视以及对援助效果与影响力的初步评估。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旗舰报告，旨在全面概述全球高等教育援助的流动情况。该报告不仅揭示了主要趋势，还证实了先前研究的发现：高等教育援助分布零散，主要面向中等收入国家，且多数捐助者的援助重点集中在国际奖学金等个人层面。然而，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这些援助研究数据的来源，即经合组织 (OECD) 的债权人报告系统。我们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强调，这些数据仅反映了援助全貌的一隅，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可能带来误导。OECD 数据的一个内在问题是其有效性受限，因为不同捐助机构在自我报告援助活动时往往缺乏统一标准。而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是高等教育援助领域最需重新审视的，是过去数十年间援助格局所经历的复杂多变。

新捐助者

这一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捐助者的涌现，他们积极投身于高等教育的国际援助

行列，包括私人慈善基金会及新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万事达卡、开放社会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及康拉德·希尔顿基金会等引领的私人发展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正稳步增长。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通过国内奖学金、财务援助及项目升级等方式，增强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机会与质量。同时，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的双边援助也在不断增加，这标志着它们正逐步从援助的接收方转变为重要的捐助方。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家在高等教育援助领域仍保持着双重身份。类似于阿拉伯海湾国家及其他非 OECD 国家的援助模式，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支持主要集中于国际奖学金及资助在捐助国留学的生活费用。地缘政治因素在这些资金流动的战略决策中显而易见，这一点与传统捐助国的做法不谋而合。

这些资金流动相较于传统捐助者的显著不同，主要在于其透明度与表现形式的差异。尽管 OECD 框架下的双边捐助者需遵循透明度原则报告其援助活动，但新加入的捐助者虽可选择加入以增强透明度和促进地缘政治合作，却并无此强制义务。慈善基金会亦遵循相似模式，仅在条件允许时参与报告，导致仅规模最大的私人机构贡献被 OECD 所记录与统计。随着这两类捐助者对高等教育支持力度的持续增强，OECD 数据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严重削弱了作为国际援助领域唯一且最常用的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此外，数据集的某些分类标准显得僵化且过时，难以准确反映南南合作及东南外资中的新兴与复杂模式。例如，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复杂贷款包或巴西与葡语国家间的高等教育跨国合作项目等新型资金流动，均超出了传统分类的范畴。因此，这些资金流动大

多未纳入 OECD 数据库，需借助如 AidData.org 等调研机构的数据拼凑而成，最终形成的资金流动图景仅勉强与我们对“援助”的宽泛理解相契合。

新的援助形式

相反，传统捐助者向 OECD 报告的活动透明度，并不直接等同于其对高等教育实际提供的实质性支持程度。众多 OECD 内的主要捐助国，如德国、法国、日本、奥地利及英国等，其高等教育援助的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资助本国的国际奖学金项目，实质上是在扶持本国的大学与经济发展。此外，高等教育研究资金也日益被冠以援助之名，并计入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之中，通过诸如英国全球挑战研究基金和牛顿基金等复杂机制，促进英国与国际大学及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类似奖学金制度，这类资金中的许多同样带有自利性质，最终流向国内，利用援助资金推动本国的科研发展。

尽管捐赠者将奖学金归类为高等教育援助，但官方发展援助资助的研究通常按其目标领域进行不同的分类。然而，这种形式的研究资金通常涉及、培训或增强全球南方的学者和大学，作为一种间接的高等教育援助形式。由于这些巨额资金未反映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援助指标中，我们认为，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的援助同样重要，有助于理解高等教育援助流向的整体情况。

这一趋势促使我们深入反思何为真正的援助以及援助的实际受益者是谁，这些问题变得愈发必要且关键。在国际援助的广阔领域里，这样的质疑并非新鲜事。然而，它们却为重新审视并改进我们如何分类、量化高等教育援助提供了宝贵的契机，特别是在评估这些援助对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及学者能力

提升方面的影响时尤为重要。至于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落实这些改进，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但在此之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审视现有的可用数据，并明确其中存在的关键性遗漏。

出版商、引文索引与不平等的全球科研经济

大卫·米尔斯

大卫·米尔斯 (David Mills)：英国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教育系副教授、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件：david.mills@education.ox.ac.uk

现今，科学交流的主导途径已转向由商业出版商与数据分析公司所掌控的数据与出版平台之上。这一现状何以成为全球大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原因在于，政府与科研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正流向期刊订阅、数据服务以及作者出版费用的支付，而这些开支正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若要深刻理解大学在构建这一体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视线需回溯至罗伯特·麦克斯韦 (Robert Maxwell) 与尤金·加菲尔德 (Eugene Garfield) 两位先驱的创业宏图。两人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各自独立创办企业，却都不约而同地重塑了学术出版领域，推动了科学知识的全球流通。尽管在商业战场上他们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他们的努力与影响却如同经纬交织，共同编织了今日学术交流的格局。

二战硝烟散去后，政府对科研领域的资助力度实现了显著飞跃。麦克斯韦，这位源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难民，在为英国军队效力后，转而在柏林担任军事情报官员，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助力德国知名出版社施普林格 (Springer) 重焕生机，并秘密策划将大量学术期刊运往英国。1951 年，他成功购得六份科学期刊及两套教科书系列的英国发行权，标志着帕加蒙出版社 (Pergamon Press) 的诞生。随后的十年间，帕加蒙出版社迅速崛起，分发了多达 59 种科学期刊，并

持续扩张其版图。麦克斯韦深谙吸引顶尖科学家的重要性，他积极寻求合作并赢得他们的信赖，携手在新兴科学领域内创办了多份享有盛誉的期刊。随着公司每隔数年便实现规模翻倍的惊人成长，麦克斯韦深刻意识到科学出版行业的巨大盈利空间，仿佛扩展之路永无止境。尽管出版业的商业化转型遭遇了不少质疑之声，但帕加蒙出版社凭借其对编辑自由的承诺及高效的技术手段，大幅缩短了出版周期，从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稿件投稿与期刊订阅。慷慨的编辑报酬、奢华的聚会以及丰厚的差旅补贴，更是成为了吸引并留住编辑团队的强大磁石。这些编辑们对麦克斯韦保持着高度的忠诚，即便在他因一场收购战而短暂失去对帕加蒙的控制权五年后，他们依然伸出援手，助其重返帕加蒙。尽管麦克斯韦后来因滥用《镜报》 (Mirror) 养老金基金而名誉扫地，但帕加蒙出版社所开创的先河已永久性改写了科学出版的游戏规则，将其推向了全球盈利的巅峰。

引文索引的影响是什么？

科学知识生产的快速增长，部分归因于帕加蒙与爱思唯尔等商业巨头的雄心勃勃，这一进程催生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有效管理随之而来的信息洪流。尤金·加菲尔德，一位自诩为“信息科学家” (information

scientist) 的先驱, 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应对策略。他的初步方案名为《当前内容》(Current Contents), 这一服务通过复印并整理期刊目录页, 以订阅形式提供给用户, 帮助他们紧跟各自领域的最新科研动态。该服务的商业成功不仅奠定了其基础, 还催生了“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英文简称“ISI”) 的诞生。在获得美国空军资助后, 加菲尔德于 1963 年推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为 SCI),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数据库, 汇集了来自他精心挑选的 560 种“核心”科学期刊的所有引文, 这些期刊被他视为各自领域内最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 这 560 种期刊中, 有七成是在美国或英国出版的, 剩余部分则几乎全部源自欧洲, 这反映出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科学出版视角, 其背后是商业出版商及其庞大的订阅收入体系。尽管德国在战前科学领域占据显赫地位, 但在 SCI 所索引的期刊中, 德国出版的仅占 7%。更令人遗憾的是, 没有非洲期刊被纳入索引范围, 而中国也仅有两种期刊得以入选。然而, SCI 的索引范围迅速扩张, 至 1968 年已覆盖 2000 种期刊, 到了 1979 年, 这一数字更是翻倍增长, 但欧洲与美国出版经济的学术地理分布特征在 SCI 中依然根深蒂固。

引文索引开始界定何为“受认可”的学术知识。对于学者们而言, 能够被这些索引收录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成就, 而商业出版商则因其技术实力和财力支持, 在满足索引的技术门槛及支付高昂订阅费用方面展现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同麦克斯韦在出版界所展现的公关与市场营销才能一样, 加菲尔德也擅长此道, 他成功地将 SCI 及其他 ISI 服务推广至全球各地, 包括苏联在内的诸多

国家。面对那些试图质疑 SCI 覆盖范围公正性的声音, 特别是针对 SCI 对“第三世界”期刊可能存在歧视的统计证据, 加菲尔德均予以了坚决而有力的反驳。

正如罗伯特·默顿所预见, 引文索引的衡量标准逐渐演变成了学术界竞相追逐的目标。大学、学者及出版商纷纷采用引文索引作为竞争的工具, 利用其中的引文数据, 依据引用次数及期刊的“影响因子”对研究人员进行排名。加菲尔德所创造的这一机制, 无形中成为了衡量学术成就与机构表现的重要标尺。多年来, 这一索引系统的运营一直得到《当前内容》服务所带来收入的持续补贴。在加菲尔德于 2017 年逝世后, 一位撰写其讣告的作者赞誉他为“有远见的人”, 而非仅仅是一个“记账员”, 随着数字化, 其全部商业潜力得以实现。2000 年代初, 第一批全球大学排名使用 SCI 引文数据来评估学者。期刊元数据(如引用)越来越成为爱思唯尔等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 该公司于 2004 年设立了一个竞争对手引文索引(Scopus)。2011 年, 汤森(Thompson)以 35 亿美元将加菲尔德的原始业务出售给克拉里韦特(Clarivate)。

未来会怎样?

自麦克斯韦创立帕加蒙出版社以来的 70 年间, 学术期刊出版业已转变为一个盈利的全球产业。数据分析变得比期刊出版更有利可图。今天, 学术声誉和地位是通过期刊排名、“影响因子”和“h 指数”来衡量的。引文索引的力量因数字化和金融投资而得到放大, 必然优先考虑欧美学术网络和商业利益。尽管存在去殖民化开放获取与促进独立出版商所倡导的书目多样性的呼声, 两大商

业引文索引仍在全球南方学术出版领域投下深刻影响，导致非英语及地区性期刊因未被纳入索引而陷入隐形状态，这不仅加剧了学术地理的分层现象，也破坏了既有的区域知识生态体系。同时，未被索引的期刊在非英语世界普遍面临着持续的合法性质疑。

“钻石”开放获取（Diamond Open Access）的欧洲倡导者构想了一个基于社区共有的出版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的全球研究系统，旨在促进更广泛的公平性。然而，实现这一“钻石”模式，即向作者与读者免费

提供出版服务，需巨额投资与实质性支持作为后盾。若欲将此愿景拓展至资源丰富的欧洲大学之外，全球范围内的政府与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携手，共同资助建设必要的研究基础设施。要想打破由麦克斯韦与加菲尔德所塑造的既有格局，尚需付出诸多努力与不懈奋斗。

注：本文源于 2023 年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工作论文也可查询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网站。

美国招生中的种族问题：它未曾结束，除非我们放手让它消失

拉凯尔·穆尼斯、安德烈斯·卡斯特罗·萨马约亚

拉凯尔·穆尼斯 (Raquel Muñiz)：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 Human Development) 及法学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munizcas@bc.edu

安德烈斯·卡斯特罗·萨马约亚 (Andrés Castro Samayoa)：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castroar@bc.edu

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可能都会认为种族问题已经从大学招生过程中被彻底清除。大学校长、报纸头条和政治评论员们都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的招生政策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原则的判决，视为 (不出所料的) 平权行动政策在保守派倾向的美国最高法院手中宣告死亡的标志。

历史和国家背景

认为大学招生过程不可再将申请者的种族视为考量因素的一部分，是对美国新法律现实的误解。此外，这也是对种族意识招生政策实践的误解。该政策最初是为了解决几十年的种族歧视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补救措施。种族在大学招生中的使用，源于美国最高法院在 1954 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该案件声称，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然而，随后的判例削弱了种族融合学校

的努力，剥夺了布朗案的初衷与精神，使得种族在大学招生中的使用仅限于促进多样性这一广泛目标，迫使高校追求“种族中立”的做法，并导致白人女性成为平权行动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学者们发现，种族在招生中的有意识使用依然是促进种族多样性的最有效方法，而其他做法，如抽签或用社会经济地位替代种族，效果则不尽如人意。

但是，那些庆祝美国最高法院近期裁决的保守派活动家，利用公众对种族意识招生政策 (尤其是平权行动政策) 的肤浅理解，传播了一个错误观点——即在招生中使用种族现在已完全违宪。这一做法还在多个教育领域引发了危险的连锁反应，超出了择优大学招生的范畴，并且在法院裁决发布不久后便开始蔓延。例如，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向该州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布指导，要求“立即停止在招生、奖学金、课程项目和就业等决策中使用种族标准。”

宣称“平权行动已经结束”的言论脱离了现实。事实上，仍然存在途径可以确保学生的种族身份既不会从大学招生过程中被抹去，也不会从各院校为实现种族平等和多样

性所做的广泛努力中消失。

我们提供了两条希望的路径，帮助教育领导者、家长和学生更好地理解法院裁决所设定的新参与规则。

法院的裁决范围较窄

对法院裁决的广泛且合理的解读是，裁决本身的范围是狭窄的。从一开始，法院就将其审理的问题框定为仅涉及招生，并在整个裁决中广泛使用“申请者”（applicant）一词，反复强调法院认为大学招生是零和游戏的观点。多数意见书始终聚焦于这一狭窄问题，只有在阐述招生问题时才稍作偏离。

这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空间，使其在其他种族意识政策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小。例如，旨在增加申请者种族多样性的针对性招募计划，以及支持在校学生的其他项目干预措施，依然不受影响。然而，这些措施仍将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投入大量资源。

招生过程中仍可考虑种族因素

法院明确指出，“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大学考虑申请者讨论种族如何影响其生活，只要该讨论与申请者能为大学贡献的某种品格或独特能力有明确联系。”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考虑种族，特别是在种族作为其他“盲审”因素的一部分时，这些因素（矛盾的是）实际上也受申请者种族的影响。正如法院所指出的，这可能包括申请者描述种族歧视如何促使他们培养勇气和决心，或申请者的文化和遗产如何促使他们发展领导力技能。换句话说，只要这种考虑与某种“盲审”特质相关联（尽管这些特质受到种族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可以在招生中考虑种族。法院所禁止的是种族的直接使用。

令人忧虑的连锁反应

然而，这一裁决的下游效应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在新法律环境下推动种族多样性的努力。关于裁决及其范围的错误信息开始泛滥，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法律允许与禁止的内容产生混淆。更广泛地说，研究表明，法律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使得教育领导者在感受到敌对法律环境的情况下，会为了避免诉讼或报复而自我审查，即便法律允许他们以促进公平的方式采取行动。

此外，我们需要将这一裁决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进行解读。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教育权利仍然在通过法院和立法进程中被政治化和倒退。敌对的保守派运动将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倒退措施，阻碍种族边缘化学生的进步。考虑种族的高等教育政策可能会面临强烈反弹。

结语

尽管美国最高法院继续沿着一危险的道路前行，进一步削弱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权利，但正如预期的那样，即当代保守派运动的特征，首席法官罗伯茨及其多数意见借用过去用于推动黑人及其他受压迫群体权利的民权语言，反而来削弱这些权利。法院的多数意见错误地将“盲审”观念纳入平等保护法的理解中。这些解释将继续影响未来案件中法律平等问题的审理。

正如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Justice Sonia Sotomayor）在她的异议意见中所指出的，这一误导性裁决“建立在种族不平等已成过去的问题的幻觉之上”，并无任何值得庆祝之处。法院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异议意见引用了严谨的实证证据，明确指出种族不平等依然困扰着美国。然而，理解我们在应

对这些挫折中的选择至关重要，否则，在迈 望所诱惑而止步不前。
向种族正义的漫长旅途中，我们可能会被绝

法国：平等机会与择优录取

安德烈·苏尔索克

安德烈·苏尔索克 (Andrée Sursock)：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高级
顾问

电子邮件：andree.sursock@eua.eu

2018 年，法国对其高等教育集中录取程序进行了改革，推出了高校统一招生平台 Parcoursup，此前的大学录取程序随机将学生分配到高等教育机构。由于 Parcoursup 系统提供了比之前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学生做出选择，人们曾期待它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然而，系统一经推出，就因组织了一种变相的选拔过程而受到批评，已有研究跟踪了其对边缘化群体的负面影响。

平等机会与精英主义

在法国，人们对于提供平等机会 (égalité des chances) 并因此开放高等教育入学资格有着广泛共识。然而，这种共识与“共和精英主义”理念并存不无矛盾。这一理念体现在由拿破仑为大学校 (grandes écoles, 法国教育部定义为“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学生并确保优质教学的高等院校”) 引入的分级竞争性考试 (concours) 中，而这种考试导致了社会再生产。

这种矛盾产生了双轨制：所有高中毕业文凭 (baccalauréat) 持有者都可以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但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学专业设有择优录取，还有大学校及不断扩大的私立教育领域。

关于平等的社会共识也与个人策略存在冲突。许多法国家庭倾向于择优录取，但他

们根据自身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以不同方式定义择优录取。对于中产阶级、教师和学术人员的子女来说，择优意味着以入学大学校为目标，其次是大学的选择性专业。这些人通常熟悉如何在复杂的中学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穿行。而对于边缘化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来说，择优则意味着追求私立教育的稳定性——私立教育常常宣传自己（较其他大学而言）为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及更为亲近的学习环境。

边缘化背景的学生在 Parcoursup 系统中的表现如何？

在法国，公平 (equity) 问题主要基于社会经济背景来定义。法律禁止考虑种族、宗教或种族背景，中学对弱势群体的正式支持较少，残疾学生是唯一的例外。Parcoursup 系统旨在通过向边缘化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来缓解不平等，但并未重点支持特定类别的学生，残疾学生再次成为例外。

资金问题在法国并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公共教育费用普遍较低，并提供基于需求的奖学金。根据《欧洲学生 2018~2021》(Eurostudent VII 2018~2021) 报告，法国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仅不到 19%，尽管在新冠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后这一比例有所上升。

尽管法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强调平等（equality）和团结的传统，但它在 OECD 成员国中依然是社会不平等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欧洲学生 2018–2021》报告指出，大多数学生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父母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学生比例正在下降。

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的不均衡上，也体现在学业成功率的差异中。女性和父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低的自信心，这直接影响他们对学习项目的选择，进而导致特别是在大学校中的性别和社会失衡。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校需要为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为此，这些学校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帮助位于贫困社区的学校的优秀学生准备申请，或为这些学生设置不同的录取渠道。然而，通过这些举措受益的学生人数仍然有限。

在历史上，相当一部分进入开放入学通道的大学生未能完成第一学年，其中大多数是持有职业类高中毕业证书的学生，而这一群体中有大量来自弱势背景。这类教育课程并非为进入大学而设计，但也并不禁止学生注册。

Parcoursup 系统：备受争议的集中分配系统

Parcoursup 系统采用了一个算法，被批评为在本应允许所有高中毕业生申请任意大学的背景下推行了不透明的筛选过程。这一情况引发了激烈反响。2018 年初，随着一群蒙面人员袭击了 50 名抗议 Parcoursup 系统的学生，关闭大学的运动迅速蔓延。幸运的是，随着夏季的到来，事态逐渐平息。

尽管如此，Parcoursup 系统仍然存在争

议。尽管政府确实付出努力解释筛选过程，并尝试让系统更加透明，但公众讨论的焦点已从筛选机制的选择性转向了由此引发的焦虑，尤其是质疑是否所有家庭和学生都具备应对系统复杂性的能力。

Parcoursup 系统：复杂的申请流程

毋庸置疑，Parcoursup 系统的流程十分复杂。如果家庭无法提供帮助，学生往往只能独自应对，而大多数法国学生在 17 岁时就要经历这个过程。最新研究指出，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相对更可能孤立无援，并且事先能获取的独立信息有限。

在缺乏建议和支持的情况下，申请流程会显得非常繁重。2023 年，Parcoursup 系统提供了多达 2.1 万个本科项目，申请者最多可申请 20 个项目，并且每个项目都需要单独填写一份申请文件。

尽管流程复杂，Parcoursup 系统努力在选择性与公平性之间取得平衡。最终的录取由各高等教育机构自行决定。在大学中，各个院系会自行筛选学生，且需按照比例招收一定数量的基于需求的奖学金学生。

压力与公平感

Parcoursup 系统一直处于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每年春季，媒体都会追踪获得录取通知的学生人数以及仍在等待中的人数。尽管自该系统启动以来不断优化，众多关于 Parcoursup 系统的报道仍加深了人们对其不尽如人意的印象。

许多学生认为申请流程压力大且略显不公平，这种感觉在弱势背景的学生中更为普遍。公平感与学生的选择有关：他们被建议在做出决定时，将稳妥选择与具有挑战性的选

项相结合。成绩较好的学生（通常来自较优越的背景）更有可能得到家长的帮助，选择更少且更稳妥，因此不太容易感到该流程有压力或不公平。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Parcoursup 系统仍带来了一场小规模变革：如今，大学可以

像大学校一样进行择优录取。然而，对 Parcoursup 系统的持续关注及法国社会对“机会平等”理念的共识，确保了“机会平等”始终位居公共讨论的前沿，即便尚未完全实现。

南非大学基于种族招生的复杂性

奇卡·塞胡尔、科拉沃尔·塞缪尔·阿代耶莫、拉卡迪·帕特兰

奇卡·塞胡尔 (Chika Schoole)：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retoria) 高等教育教授
兼教育学院院长

电子邮件：chika.schoole@up.ac.za

科拉沃尔·塞缪尔·阿代耶莫 (Kolawole Samuel Adeyemo)：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育管理
与政策研究系副教授

电子邮件：Samuel.adeyemo@up.ac.za

拉卡迪·帕特兰 (Rakgadi Phatlane)：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育学院经理

电子邮件：Rakgadi.Phatlane@up.ac.za

多年来，种族一直是南非大学招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大学利用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将大多数黑人学生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历史上白人主导的大学。基于宪法提倡的“公平歧视”或平权行动，后种族隔离时期 (the post apartheid era) 的大学制定了包容性的种族政策，以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政府为大学设定了黑人学生的录取目标，期望通过这些政策，推动大学去种族化并实现学生群体的多元化。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挑战。一方面，有人认为基于种族的政策降低了录取标准，主张采用基于成绩的招生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除非设定种族配额和目标，否则大学将难以真正实现变革。本篇文章对这些对立观点进行分析。

观点一：支持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

支持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的人引用宪法，强调在“根深蒂固的非正式种族歧视”

背景下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1994 年南非获得自由时，继承了一个高度分裂、不平等且种族分隔的高等教育系统，大学入学率 (即在 18 至 24 岁年龄段内的总入学人数与总人口之比) 仅为 17%。该系统的不平等表现为按种族群体划分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尽管黑人南非人占全国人口的 80%，但只有 9% 的学生是黑人；有色人种学生占 13%，印度裔学生占 40%，而大多数学生 (70%) 是白人 (尽管白人只占全国人口的 10%)。新政府决定，纠正这些不平等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为那些符合学术要求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在许多历史上白人主导的大学中，某些学科设置了每个种族群体的入学目标，以提供机会并提高那些曾被排除的种族群体在该学科的录取率。这种做法被反对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的人视为不公平，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将导致质量和标准的下降。

观点二：支持基于成绩的招生政策以保持质量和自主性

为了维护质量和大学自主权，支持基于优点的招生政策的论点应运而生，特别是集中在质量、大学自主权和不干涉大学事务的问题上。换句话说，大学有道义责任只录取符合资格的学生，而不考虑种族。南非一些顶尖的历史悠久的白人大学曾面临是否继续或停止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的压力。这些大学因其声誉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因此应该摒弃种族作为录取标准，转而侧重学术表现。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想进一步改革这些大学，唯一方式是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所创造的种族障碍。相反，也有担忧认为，除非使用“种族”这一标准，否则某些大学无法实现转型。不同的论点让大学的自主权以及其关于质量和招生的内部政策受到质疑。虽然一些大学声称已完成转型，但对于其中一些大学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种族招生政策有效。

观点三：废除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转而根据经济和社会劣势状况进行招生

开普敦大学的调查委员会建议修订招生政策，使用根据经济和弱势身份进行招生，从而取代种族因素。委员会建议采用其他弱势标志作为依据，结合学术表现和如所读学校、父母和祖父母的教育水平等因素，而非种族。

这一观点反映了招生辩论的转变，焦点逐渐从种族问题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随着自 1994 年以来黑人中产阶级的壮大，种族已不再是唯一能有效反映社会不平等的标尺。这一群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可以将子女送入优质学校，因此不再被视为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

这种观点同样体现在政府资助的学生财政援助计划（Student Financial Aid Scheme）

的资格标准中。除了学术标准外，该计划不再以种族为依据，而是将经济状况作为主要标准，特别是针对年收入低于 35 万南非兰特（约合 1842 美元）的家庭。那些来自领取政府社会保障补助家庭的学生会自动获得资助。

机会与成功

一个重要问题是，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是否有效帮助这些政策受益者获得成功。数据显示，情况并不乐观，这表明获得入学机会并不总能转化为成功。过去二十年间的研究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业，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四年内顺利毕业。研究还表明，辍学率为 52%，这削弱了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在提高入学机会方面的成就。南非的毕业率仅为 15%，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经济原因、学生的入学水平较差、学术支持不足以及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压力是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

改变录取政策的需求

目前存在一种担忧，即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需要进行变革。根据 2021 年南非学生人口的变化（黑人占总学生人数的 79.5%，即 106.8 万名学生），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排除其他群体。文献表明，平权行动政策贬低了优秀黑人学生公平竞争的能力。似乎大多数黑人学生在通过种族政策进入大学后经历了认知失调。这些“弱势”学生感到自己有能力竞争，并希望在没有种族因素的情况下竞争。这种立场在黑人学生表现出色时尤为明显，他们的成绩往往没有被视为基于能力，而是归因于平权行动。还有人担心平权行动不公地对待处于劣势的白人学生，并且即使一些富裕的黑人

学生过去 30 年受益于经济机会，他们仍然在招生中得到优待。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政策，以超越种族这一招生标准。

结论

本文的讨论强调了根据不同国家情况制定大学招生政策时应采取平衡的方法。在南

非，种族依然是影响大学招生的关键因素，但可以与其他不利因素相结合，从而在招生政策的发展和应用上采用更为细致的策略。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在未来高等教育中如何纠正、如何改进质量以及如何推进可持续性目标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平权行动

埃蒙·南迪、比奈·K·帕塔克

埃蒙·南迪 (Emon Nandi)：印度塔塔社会科学学院 (the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nandi.emon@gmail.com

比奈·K·帕塔克 (Binay K. Pathak)：印度马欣德拉大学 (Mahindra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binaykumarpatak@gmail.com

2023 年 9 月 19 日，印度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规定议会中 33% 的席位将保留给女性。这类平权行动政策在印度通常被称为“预留政策”。除了立法机构外，预留政策还适用于教育和就业领域。预留政策旨在减轻印度社会落后阶层所面临的贫困和压迫带来的不利影响。该政策主要涵盖官方认可的边缘化群体，即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以下简称 SC)、表列部族 (scheduled tribes，以下简称 ST)、其他落后种姓 (other backward castes，以下简称 OBC) 以及经济弱势群体 (economically weaker sections，以下简称 EWS)。目前，27% 的席位保留给 OBC，15% 保留给 SC，7.5% 保留给 ST，10% 保留给 EWS，4% 保留给有残疾人士。自引入以来，预留政策一直是印度社会政治和司法界讨论的焦点。在此，我们将围绕预留政策的新兴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关注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中的预留政策影响

由于精英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名额有限，预留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自 2006 年在高等教育中引入

针对其他落后种姓 (OBC) 的预留政策以来，这些争论变得更加激烈。

得益于预留政策，印度高等教育中来自弱势社区的学生代表性逐渐提高。根据 2020–2021 年度的《印度全国高等教育调查》 (All-India Survey of Higher Education)，相较于 2014–2015 年，表列种姓 (SC) 和表列部族 (ST) 群体的总入学率分别增长了 28% 和 47%，其他落后种姓 (OBC) 学生的整体入学率增长为 31.67%。

在高等教育教师方面，情况严重偏向于特权群体。表列种姓 (SC) 教师的比例仅为 9%，而表列部族 (ST) 群体的教师比例仅为 2.5%。相比之下，其他落后种姓 (OBC) 教师在印度大学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大约为 32%。在行政管理层，来自边缘群体的校长和教务长严重代表不足。截至 2022 年 8 月，在 45 所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只有两位来自社会落后阶层。

新兴问题

让我们逐一探讨主要的新问题。

公立与私立机构

在印度，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遵循预留政策。然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没有义务遵守这些预留规定。随着越来越多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许多就读于这些机构的学生无法享受预留政策的福利。尽管政策制定者曾多次尝试将预留政策的范围扩大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这些努力均未成功。据报道，一些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对这一提议表示反对，认为相关的监管限制将对其财务可持续性构成挑战。这些机构主张，与其要求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预留政策，不如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近期邀请国际分校进驻印度的举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监管挑战。

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社会融合不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顶尖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自杀和辍学事件引发了对预留政策局限性的严重质疑。2014~2021 年间，在印度顶尖高校自杀的 122 名学生中，24 人来自表列部族（ST）群体，41 人来自其他落后种姓（OBC）群体，3 人来自表列种姓（SC）群体。这凸显了边缘化群体未能有效融入高等教育机构中更广泛的学生群体。印度大学资助委员会曾发布指导方针，建议各高等教育机构设立平等机会中心，以有效落实预留政策。然而，这些措施未能为社会弱势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中非预留群体缺乏对预留学生的敏感性，是导致这种糟糕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益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尽管近年来边缘化群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机会有所改善，但预留学生在性别、地区和学习领域之间仍存在广泛差异。其他落

后种姓（OBC）群体的比例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似乎压倒了表列种姓（SC）群体和表列部族（ST）群体的代表性。

表列部族（ST）群体 SC 和 ST 群体的代表性。然而，由于社会和经济落后程度的交织，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经济条件较好的其他落后种姓（OBC）群体（被称为“奶油层”）已被排除在预留政策之外，但表列种姓（SC）群体和表列部族（ST）群体没有类似的排除条款。为防止在高等教育中影响力较大的表列种姓（SC）群体过度代表，部分人要求在表列种姓（SC）配额内引入子配额。政府目前正在审查这一提案。

联邦主义与政治化

在印度，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各省政府也有权根据各自的人口状况为特定弱势群体提供预留配额。经济较弱群体（EWS）的预留权由各省政府自行决定。尽管最高法院曾裁定种姓预留比例上限为 50%，某些族群仍然经常要求纳入教育和社会落后阶层（ESBC）配额。这导致印度各省出现社会动荡。然而，当高等教育机构中预留席位的数量超过开放或非预留席位的数量时，这无意中就会引发社会紧张，破坏社会和谐，从而违背了预留政策在印度社会中促进公平的初衷。

结论

预留政策在提升边缘化群体在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包容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影响可能不尽如人意。预留政策在印度的选举政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修订和重构预留政策以确保其有效性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然而，

在决定是否维持现行政策之前，有必要进行基于证据的客观分析。全国范围内进行种姓普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将为进一步修订预留政策提供基础。此外，必须专注于在高等教育机构内营造安全的民主空间，以提升政策的有效性。除了社会污名化之外，对精英

主义的过度推崇也是导致高等教育中“预留”与“应得”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预留政策无疑帮助了一部分边缘化群体改善了经济状况，但他们仍然遭受印度社会上层的歧视。

巴西高等教育中的平权行动

费尔南达·莱亚尔

费尔南达·莱亚尔 (Fernanda Leal)：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 (Federal University of Santa Catarina) 国际关系主任

电子邮件：fernanda.leal@ufsc.br

直到 2000 年代，巴西的公立大学才开始实施平权行动政策，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并为社会边缘化群体提供更平等的条件。2012 年的第 12.711 号法律是这一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该法律规定了新的招生规则，明确 50% 的本科生名额需保留给完成公立系统中教育的学生，其中包括人均家庭收入不超过 1.5 倍最低工资的家庭，以及黑人、棕色人种和原住民学生。2016 年，这项法律又将符合低收入经济条件的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

这一政策及其他相关的平权行动措施在推动巴西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适应其结构及存在目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 2012 年至 2021 年，超过一百万名高等教育学生受到了配额法的保护。从 2014 年起，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本科生中，60% 来自公立学校，70% 的学生来自人均收入不超过 1.5 倍最低工资的家庭。就种族构成而言，2019 年，黑人和棕色人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 50%。

由于政治环境更加开放从而考虑到更多少数群体的诉求，以及社会运动的积极推动，配额法于 2023 年进行了修订，将“基隆博拉人”（逃离奴役的非洲裔社群的后裔）纳入保障范围，并降低了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最高收入标准。新法律版本还为黑人、棕色人种、原住民和残疾人在研究生项目中的参与制定

了新的准则，并引入年度监测周期。

这一更新旨在弥补法律实施十年以来发现的一些缺陷，并有望进一步促进巴西公立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然而，仍有许多相关问题未得到解决，继续挑战着历史修复、社会正义和尊重多样性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正是平权行动的核心理念。

挑战与潜在结果

关于平权行动政策的效果，学术文献中的观点存在争议，而这一问题因缺乏有效的结果监测而更加复杂化。以下将探讨一些相关的挑战。

公共资金

巴西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社会资助，这一事实始终是激烈辩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批评之一是其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准入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全社会共同支付的教育资金却只为少数人服务，尤其是在社会差距显著的巴西，这一问题自始至终充满争议。

随着平权行动的实施，学生群体的总体结构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变化，现在更好地反映出巴西社会的多样性。尽管这一转变本应有助于减轻这种争议，但巴西公立高等教育的免费制度依然饱受质疑，且面临来自全球

市场的更大压力以及保守精英阶层的更为尖锐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尔索纳罗（Bolsonaro）政府时期，巴西的公立大学遭到了严重的去合法化。正如我与马塞洛·克诺贝尔（Marcelo Knobel）在 2021 年发表于《国际高等教育》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这导致了“悲剧的连锁反应”。

学生保留问题

在将弱势学生纳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时，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是这些学生的保留问题。黑人学生辍学率较高，这不仅是由于政府支持项目中断，使他们难以继续学业，还因为他们在校期间面临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

在财务支持方面，大部分知名大学仍位于首都城市，而提供给弱势学生的奖学金往往不足以维持基本生计。直到 2023 年，奖学金在 10 年后才被调整到合理水平。经济压力导致部分学生需要工作，成为他们对大学失去兴趣的原因之一。例如，2022 年申请巴西联邦大学主要入学考试（Enem）的考生人数为 340 万，是 2005 年以来的第二低值，而 2014 年这一数字曾高达 870 万。

在学术表现方面，通过平权行动政策入学的学生因基础教育薄弱而面临困难，这需要机构在监督和学业支持上进行大量投入。从本质上讲，平权行动并不能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良好的学术水平。

此外，教育机构在应对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方面准备不足。关于配额生与非配额生之间隔阂的报告表明，学术共同体亟需进行全员意识教育和更多投资，以促进更深层次的包容性文化。

包容性及其争议

尽管平权行动政策显著增加了本科生的多样性，但在研究生和教职人员中，性别、种族和地域来源方面的巨大不平等依然存在。此外，如果学术模式和知识生产仍以主导话语为核心，仅仅实现入学机会的民主化可能不足以引发所需的结构性变革。大学应借此机会，通过接纳社会边缘群体来反思自身在延续殖民主义方面的角色，并以更加非等级化的方式与社会对话。

国际化

关于巴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批判性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带有殖民和被殖民的特征，更具竞争性而非合作性，并且既不适合全球南方的需求，也未向其倾斜。各大学在国际化中追求更高的国际认可，更多地将其视为提升个体竞争优势的工具。

国际化本质上仍具有精英化的特征，大多数国际化机会仅面向一小部分学生群体。国际学术流动奖学金通常所设的条件，对于那些接受过薄弱教育背景的学生来说难以达成。

最近，国际化策略中似乎出现了一些对去霸权化的重要性的认可。比如，公布的“非洲与美洲之路”项目（Caminhos Amefricanos）旨在国际范围内推动反种族主义教育，以及重新启动的“阿迪亚斯·纳西门托”项目（Abdias Nascimento），为少数群体提供在巴西及海外研究卓越中心学习的机会。

潜在结果

巴西高等教育中的平权行动政策所带来的个体和集体影响不可忽视，因为这些政策已对历史上精英化的机构总体形象提出了挑

战。然而，要为代表性不足的学生创造必要的成功条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效的入学后支持、大学社区的准备、反对种族主义、与社会的对话以及对政策效果的持续监测，都是实现真正社会正义对话的关键要求。从

长远来看，平权行动的最大潜力可能在于受种族主义和歧视影响的群体积极参与重写他们的历史，并推动反种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教育的推广。

我们还能阻止国际化的终结吗？

保琳娜·拉托雷、乌韦·布兰登堡、汉斯·德·维特

保琳娜·拉托雷 (Paulina Latorre)：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Sacro Cuore Milan)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博士生

电子邮件：paulina.a.latorre.b@gmail.com。

乌韦·布兰登堡 (Uwe Brandenburg)：捷克共和国全球影响力研究所 (the Global Impact Institute)

执行主任，法国 ESCP 商学院 (the ESCP Business School) 访问教授

电子邮件：uwebrandenburg.ub@gmail.com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荣誉教授、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件：dewitj@bc.edu

2011 年，我们中的两位作者（乌韦·布兰登堡和汉斯·德·维特），在《国际高等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化的终结》的文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从机构关注的边缘发展到了核心，但尽管它获得了更多的道德意义，其内容似乎却在退化。我们观察到，在国际化的旗帜下，商业化日益加剧，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态度加剧了国际化的贬值和防御性措施的膨胀。我们认为，“逐渐地，‘为什么’和‘目的’已被国际化成为主要目标所取代：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学位流动、更多的招生。”我们呼吁，必须以其本质的意义来理解国际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并且要摆脱无知的面纱，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某些事情，它们如何帮助实现全球化知识社会中教育和研究质量的目标？我们指出，必须将流动性和其他活动视为它们真正的意义：活动或工具——因此，它们本质上不是目标本身。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和重新定

义我们当今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12 年后，国际化还有未来吗？

这篇文章在当时像是一声警钟，引起了广泛共鸣。那么，12 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国际化的终结是否更加临近，还是我们已经扭转了潮流？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与智利合著者保琳娜·拉托雷 (Paulina Latorre) 一起，于 2023 年 9 月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 (EAIE Conference) 上组织了一场题为《国际化终结 10 年后，国际化还有未来吗？》的会议。

回顾 12 年前的情况，结果并不乐观。对于许多人来说，国际化仍然是一个仅仅从北方机构复制过来的过程，未能真正与当地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也没有与机构的优先事项产生共鸣。国际教育仍然在许多方面主导着议程，而“本土国际化”却远未得到足够关注。对国际排名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主流，这使得某些学校比其他学校更具优势。南北差

距，以及被评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国际化变得更像是竞争和市场化的代名词，而非其传统价值观（合作、交流和服务社会）。不平等和排他性在国内外都在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化的精英主义方法有关。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大学政策和战略中整合教育的各个方面，但这一进程仍然是缓慢且不均衡的。

尽管有一些反制措施试图扭转这种消极局面，比如本土课程的国际化、虚拟交流和 COIL（跨文化在线学习）、为社会服务的国际化、以及国际教育中的去殖民化和气候变化行动运动（CANIE），但在高等教育机构层面，更具社会责任化的国际化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号上，而非实际行动，往往只是一些良好的意图和孤立的实践。2015 年关于国际化的定义强调了公平、包容和对社会的有意义贡献，诸如伦理的、人文的和负责任的国际化等标签也体现了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即需要从竞争和市场化转变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良好的意图和举措，比如在鹿特丹举行的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然而，2011 年文章中关于国际化展示及像国际教育者协会（NAFSA）等组织的商业化问题的观察，至今仍然成立。我们是否真的在实践我们所宣扬的（换句话说，国际化是否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依然存在）——还是它的终结真的已经来临？

多个危机呼吁行动

这个问题如今比 12 年前更加紧迫。我们面临的不是单一危机（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是多个危机同时爆发：COVID-19 及新疫情的威胁、民族主义的反国际化运动、对民

主的攻击、种族主义、数字化与人工智能（AI）、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排斥、气候变化，仅举几例。这些危机要求的远不止空洞的言辞和声明。它们要求国际化应关注大学领导者、国际教育工作者、教师、学者和学生的行动，确保国际化既对社会负责，也尊重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国际化的终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特别是在全球北方，疫情之后，市场化的旧常态似乎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全球南方，人们则更为意识到这种方式的负面后果，感受到了排斥和不平等的影响。来自拉丁美洲的参与者在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上自豪地说道：“全球南方正在崛起。”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真正改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最终看到国际化承担应有的责任？在我们看来，国际化 1.0 时代的特点是少数人相对无结构的流动，主要带来个人收益（直到 1990 年代初）。从那时起，国际化 2.0 主要关注的是机构层面的国际化。一方面，国际化的制度化催生了良好的运动，例如结构化的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全面的国际化、可持续的校园项目以及 SDG 大学。然而，这也意味着责任和问责制落在了机构身上，而非个人。正如我们所见，机构通常在变革和社会责任方面发展得非常缓慢。这使得我们个人可以与危机、后果和责任割席分离，声称是机构需要承担责任并进行变革，而我们作为个人却可以免责，例如不必要地乘飞机去参加会议，或是未参与难民危机等。在国际化中，问责制最多是体现在机构层面，而从未体现在个人层面。

终结——或者是新纪元的开始？

因此，在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上，我们勇敢宣告，依赖于机构国际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提倡需要一种以个人为主的国际化，强调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包容性。

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识别出对我们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目标或危机——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需要优先考虑。这可能意味着专注于气候变化、包容性、南

北差距或任何其他重大问题。接着，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塑造国际化，使其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感到自己对其负有个人责任。

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国际化的终结或许正意味着新国际化的开始。

全球学生流动处于十字路口：数据为何重要？

米尔卡·马特尔

米尔卡·马特尔 (Mirka Martel)：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研究、评估与学习部门主管

电子邮件：mmartel@iie.org

在过去 20 年中，全球流动学生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当前及未来的国际高等教育讨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然而，始终不变的是数据的重要性以及全球流动趋势随时间的变化，这有助于我们研究接收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自 2001 年以来，《计划蓝图》(Project Atlas) 报告一直专注于国际学生主要接收国的可比数据，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过分析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各国高校接收学生的能力，以及诸如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对国际高等教育的影响，《计划蓝图》为比较和对比流动趋势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首选留学目的地在哪里？

根据经合组织 (OECD) 的《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报告，2001 年全球流动学生人数为 210 万。20 年间，这一总数增长到了超过 600 万，尽管在过去几年因新冠疫情导致增长相对停滞。疫情的影响不均衡，对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冲击尤其严重。根据《计划蓝图》的报告，2022 年和 2023 年国际学生人数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反弹显示，全球总数可能再次加速增长。然而，尚未可知的是，全球增长率能否恢复到疫情前每年 5% 的水平。

国际学生的主要接收国排名也发生了变

化。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接收国。2001 年，美国和英国分别占全球流动学生的 28% 和 11%。根据《计划蓝图》的数据，2023 年这一比例在英美两国都有下降，美国为 17%，而英国仍保持在 11%。来自其他英语国家的竞争加剧，其中加拿大占全球的 10%。再加上传统的欧洲接收国德国和法国，前五名接收国共接收了全球 50% 的流动学生。

留学目的地能够接收更多国际学生的能力仍然未知。《计划蓝图》报告称，就 2015 年来看，全球前十大接收国中至少有五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已占大学总人数的 10-20%。随着全球流动学生人数的增加，更多国际学生进入这些高等教育市场。到 2022 年，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国际学生已占总高等教育人数的 20% 以上。而美国在这方面是个例外，国际学生仅占其大学总人口的 6%。

未来国际学生的考量因素

当潜在的国际学生决定到哪里留学时，多种因素影响他们的选择。对于新兴的学生市场，如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主要因素是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年龄人口和当地大学系统难以满足需求的现状。虽然这些学生希望出国留学，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至关重要，以确保他们能够成功申请、学习

并顺利完成海外学业。我们已经看到来自印度的学生数量正在增加，他们选择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求学，但这些印度学生主要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倾向于在完成本科后才出国留学，这通常是短期的。这与过去十年美国接收的大量中国本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学生选择何时出国以及选择短期还是长期学习，直接影响接收国的生源渠道。

其他推力因素同样面临挑战，例如冲突和地缘政治现实。增长最快的流动学生群体之一来自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如阿富汗、乌克兰、俄罗斯及其他国家，这些学生希望在国外继续高等教育。这些学生亟需心理健康支持，同时也需要在无法回国的情况下继续学业的选项。此外，健康与安全问题仍然发挥作用，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以及旅行限制，尤其在中国等亚洲地区，继续影响学生的流动性。

对于接收国而言，拉力因素已被充分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吸引学生前往特定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成本、国际奖学金或助学金等经济激励，以及学位完成后的留居机会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接收国市场的扩展，学生的考量因素也愈加复杂，不再仅仅关注学位本身。

解构数据的意义

《计划蓝图》的工作仍在继续。自 2001 年以来，这一研究项目致力于探讨数据的收集方式，并推动数据在对齐、对比和趋势讨论中的应用。这些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谁被认定为“国际学生”或“外国

学生”，各接收国的定义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国家仅将持有该国签发的学生签证者算作国际学生，而另一些国家则将所有外籍出生的学生，包括拥有居留权的学生，也纳入统计。此外，对学生全球学术经历的计量方式也各不相同。某些国家只计算在本国攻读完整学位的学生，而其他国家则将选修学位课程的学生甚至非学位课程学生包括在内。再者，还有全球在线学习的影响问题，即各国是否能够准确统计在其院校接受在线或线下学习的学生。《计划蓝图》的分析为这些比较提供了更深的理解，使得国际学生和高等教育容量的数据计算能够同时考虑到当地的数据收集方法和现实情况。

《计划蓝图》的合作伙伴也定期交流国内和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及其背后的趋势。每年数据受多种因素影响，能探讨国内外政策、高等教育趋势及其他考量因素，可以为数据提供更多见解。《计划蓝图》的合作伙伴相互学习，不断改进数据收集的实践。例如，在线学习的兴起促使人们讨论有多少学生注册了在线课程。有些合作伙伴已收集相关数据多年，而另一些则尚未具备条件。通过交流，各方分享方法和经验。

在过去三年中，数据的快速获取尤为关键。在新冠疫情期间，《计划蓝图》在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规发布数据之前就发布并展示了数据。这种定期发布国际学生数据并提供可信来源的紧迫性至关重要。鉴于全球学生流动的情况持续变化，继续专注于数据以支持本地和国际讨论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回顾过去的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技能应解决什么问题？

斯蒂芬妮·阿莱斯、卡梅尔·马罗克

斯蒂芬妮·阿莱斯 (Stephanie Allais)：南非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教育与劳动力研究中心技能发展研究主席、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Matseleng.Allais@wits.ac.za

卡梅尔·马罗克 (Carmel Marock)：南非金山大学教育与劳动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日益严重，这加剧了关于教育项目、课程与现实世界（包括工作世界）之间关系的百年争论。这种现象体现在关于大学课程与“就业能力”的讨论增多、努力将学校课程职业化的尝试、以及政策将重点放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通常旨在引导潜在大学入学需求向职业教育转移。大学学位的扩张常被视为国家和个人的浪费性支出，有时甚至被认为与雇主和社会所需的技能和专长背道而驰。此外，国际上也普遍担忧大学教育的青年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并且在贫困国家中，失业群体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争论揭示了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常见悖论：教育既被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同时也被认为是问题本身。逻辑思路是：如果教育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改变，它就能不再引发、或开始解决各种问题。而在职业教育与培训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领域，这种“魔法思维”尤为普遍，这一点从我们对捐助者和发展机构技能干预背后变革理论的研究中显现出来。

青年失业作为核心问题，职业教育作为解决方案

应对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干预措施通常基于这样的假设：技能缺失阻碍了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获取收入的机会。与之相反的假设是，缺乏相关技能是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通过分析来自多家捐助者、发展机构和开发银行的文件，可以看出“技能不匹配”这一假设被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发展伙伴所认同。因此，干预措施常常聚焦于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一教育与培训体系被认为与劳动力市场“最贴近”。我们采访的机构普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职业教育比高等教育更能让个人更快进入工作岗位。然而，所有受访者也都清楚，职业教育体系实际上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并未以预期方式让人们就业。尽管职业教育能够通向就业的观点经常被提及，同一份文件或受访者却又迅速指出当前的职业教育并未实现这一目标。

但职业教育也被视为是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尽管职业教育与培训被视为一种直接的解决方案，它同时也被认为是教育与培训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或问题所在。这导致了各方无休止地去“修复”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中被认为存在问题的各个方面，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确保年轻人获得

技能，从而获得工作或提高收入能力。

在分析相关文件及与关键知情人士的讨论中，有一点非常清楚：对于各种干预措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或缓解了假设中的根本问题，存在非常有限的见解，更不用说它们是否真正有助于解决核心问题了。人们通常很少关注技能培养体系中某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如何复杂地影响着其他部分。

许多干预措施，却鲜有成功的明确证据

不足为奇的是，鉴于这些干预措施通常只针对被视为问题的单一方面进行修复，而忽视了将教育与经济发展战略相整合的必要性，很少有明确的成功证据。当干预措施声称在教育与经济之间建立联系时，比如技能预测，它们大多仍集中于推动教育与培训体系内部的变革，而不是在经济中产生实际影响，以满足对各种类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缺乏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整合似乎被政府和组织的结构方式所加剧。开发领域的机构以及所援助的各国政府，往往设有单独的部门、机构和部门来处理经济发展干预和职业教育与技能干预。此外，这些组织的工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机构建设战略与方法的影响。

影响政府和开发机构在职业教育领域工作的另一个因素是评估方式。可衡量性塑造了干预措施，以便向国家政府及资助开发援助的纳税人，或希望做出投资决策的治理结构提供可见的“成果”。在我们的研究中，

有三大问题显现出来。

首先，评估本身有时被视为能够带来改变的干预措施。例如，提供像世界银行《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这样的比较数据被认为对建设教育系统具有内在价值。

其次，尽管我们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但评估方式却常用短期评估。实验设计旨在测试干预措施是否能帮助目标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些评估多集中于个人的短期影响，而非整体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以支持更持久和更广泛的影响。

第三，干预措施的实施评估往往被视为主要焦点。这导致了一种“变革理论”循环：成功被定义为政策干预的成功执行或机构变革的实现，而没有考虑这些干预措施是否真正解决了最初确定的问题。

概念上的脱节

这一现象背后存在深刻的概念脱节。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理念，认为技能的形成是一种关系性现象。在这种观点下，教育和技能被视为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制度以及发展轨迹的组成部分。然而，这种方法对于开发工作来说极具挑战性，因为它要求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并涉及工作条件、工作组织和职业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个人的理念，强调通过提升个人生产力来发展“技能”，并将其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以此推动包容性增长并为新入职者创造更多机会。这种推理方式及其衍生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幻想性的思维。

重思欧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艾伦·哈泽尔科恩

艾伦·哈泽尔科恩 (Ellen Hazelkorn): BH Associates 合伙人、爱尔兰都柏林科技学院 (the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名誉教授
电子邮件: ellen.hazelkorn@tudublin.ie

2021 年 2 月, 欧盟设定了一个目标, 即到 2030 年, 至少 45% 的 25 至 34 岁人口应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到 2022 年, 几乎一半的欧盟成员国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 爱尔兰和卢森堡的比例已超过 60%。

高等教育普及化 (以及工业 4.0 和 5.0、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包括人工智能)、人口变化、再全球化力量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在改变我们对教育系统的思考方式。过去适用于少于 20% 人口的教育模式, 如今不再适合 60% 以上的参与者。

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 学士/硕士/博士的教育阶梯已经成为普遍的资格框架。近 60% 的学习者攻读学士学位, 但只有 7.7% 的学生选择短期课程。社会地位和社会优势的追求推动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而这往往牺牲了 (中学后) 职业教育与培训, 后者常常被视为高等教育的替代通道或“最后的选择”。即使在德国这样有着强大职业教育传统的国家, 社会对更高层次教育 (包括高等技术教育) 的偏好也在上升; 事实上, 许多选择职业教育的人最终还是进入了高等教育。

因此, 欧盟国家正面临日益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导致中等技能职位的空洞化。大多数新工作将在高技能的全球面向行业中

产生, 但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近 45% 的工作将需要中等技能水平。作为 2023 年“技能年” (Year of Skills) 的一部分, 欧盟报告称, 许多国家在多个关键行业 and 职业以及各个技能层次上都面临严重和结构性的人力短缺, 这一问题预计将加剧。这对公平、社会凝聚力和参与产生了明显影响。

这些发展迫使我们须要解决长期存在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中的弱点, 并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认知、结构、交付和资金问题。

欧洲各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差异

由于各国教育系统的独特性, 欧盟各国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及其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职业教育与培训通常与职业相关的教育与培训相关, 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例如, 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卢森堡和荷兰等国家涵盖了广泛的职业领域, 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专注于职业和岗位特定的培训。学徒制通常被视为“纯粹”的形式, 因为它直接将学习与特定类型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爱尔兰使用“继续教育与培训”这一术语, 涵盖成人识字教育和社区教育。

一些国家, 如德国, 具有强烈的教育轨道区分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德国在中学/高级中学阶段提供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 (I-VET), 学生在青少年时期做出决定。

二元制的方法在高等教育阶段得到复制，且有专门的应用科技大学（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如德国的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荷兰的应用科技型大学（hogescholen），或芬兰的理工学院（polytechnics）。

与此相反，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教育轨道区分和学校到工作之间的联系要弱得多。职业教育与培训通常是完成普通高中教育后的非学术性高等教育路径，为学生提供就业或进一步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德国在历史上努力促进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地位平等，但社会文化和政策因素导致在许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地位较低且资源不足。

对就业能力和生产力的关注，以及对扩大参与度和区域活力的重视，已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策和公众思维。相关提议包括：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化且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纳入更广泛的教育系统；加强职业、专业和学术之间的合作和学习路径；在课程、教学法和评估实践中更广泛地结合技能与跨学科能力；确保学习者体验的平等地位；并认可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区域研究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理念在欧盟的智能专业化计划中得到了体现。创新相关的文献和政策往往过于强调大学为基础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发明，而忽视了知识传播/利用和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忽略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提升吸收能力、知识共享，尤其是在过程和服务创新方面的直接且动态的作用。

正在发生的变化

一些政府正在重新思考治理结构。新西

兰是第一个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国家之一，2003 年成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苏格兰资助委员会（Scottish Funding Council）于 2005 年成立，威尔士创建了高等教育与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ertia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这是英格兰的榜样，英格兰在下次选举后可能会根据工党胜选来考虑相关选项。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目前也在审视各自的教育体系，提出了一种整合的“高等教育系统……其中技能培训和高等教育部门运作作为一个整体，但保持各自的优势和身份”。荷兰和葡萄牙也在重新思考其体系。

欧盟强调将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必要性，包括更新课程、教学和学习等方面。经合组织（OECD）正在讨论类似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职业教育测试。2021~2027 年“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提供了 4 亿欧元资助，建立 100 个职业卓越中心。其目标是创建跨国合作平台或技能生态系统，将职业教育提供者 and 地方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以建设能力并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创新。

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建立和维持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优先事项。该系统将巴斯克政府教育、经济发展和产业部门、经济和社会合作伙伴、职业教育中心，以及教师和学生组织在一起。与巴斯克智能专业化战略相一致，重点放在职业教育卓越上，采取综合的培训、应用创新和积极创业的方法。其目标是帮助引导巴斯克的应用创新，围绕以下优先事项组织四个中心的 19 个机构：先进制造业、数字化和互联工厂、能源以及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

2014 年，爱尔兰成立了国家学徒制办公室（National Apprenticeship Office），负责监

督学徒制的扩展，涵盖绿色技术、生物制药、酒店业、国际金融服务、保险、先进制造业和工程等领域，除了传统的建筑、电子和汽车行业外，学徒制还可以获得最高到博士级别的认证。国家高等教育办公室支持协作的高等教育项目，帮助学生从地方职业教育学院开始学习，并逐步进入大学。尽管美国也有类似的机会，但这类安排在爱尔兰及整个欧洲还是新鲜事物。

面临的挑战

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上大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地位再现了精英优势，使得“学术型”高等教育常常被视

为成功的唯一途径。虽然协作学习路径是扩大学生参与度并向大学进阶的一个受欢迎方式，但存在风险，即它们可能只是进一步巩固这一观念。最后，还有一个棘手的财政问题。研究型大学或机构对培养学生的经费投入最高；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人学习者和终身学习机会的设施和资金质量往往较为有限——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如果我们真心致力于建立一个平行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体系，提供优化的学习与发展路径，既与高等教育相当又有所不同，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资金和治理模式。

连接与合作：全球高等教育研究的连接与合作

丽贝卡·申德尔、马塞洛·诺贝尔

丽贝卡·申德尔 (Rebecca Schendel)：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执行主任

电子邮件：schendel@bc.edu

马塞洛·诺贝尔 (Marcelo Knobel)：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物理学教授

电子邮件：knobel@unicamp.br

鉴于全球范围内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学术项目和研究中心的激增，我们很容易忘记，高等教育的学术分析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业。高等教育研究社区的历史大约只有六十年，而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研究人员参与其中。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本身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这一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研究社区，涵盖了既关注高等教育的地方性/国内问题的研究人员，也包括更多关注其国际层面的研究人员。这一发展充满希望。今天，关于高等教育的集体“知识”变得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知识来自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研究者群体，这些研究者遍布全球，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中。因此，这一发展为智力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从而为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既有挑战和新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高等教育领域——包括国际高等教育这一子领域——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逐渐从其他学科的边缘走向了一个独立且成熟的学科。

发展成熟的领域，但影响力有限

然而，尽管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对高等教育具备了更多的“知识”，但在实际层面上，世界许多地方的高等教育依然处于危机之中。在许多背景下，公众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同正在急剧下降。在许多高等教育完全普及的教育系统中，年轻人越来越质疑获得大学学位对其未来就业前景的重要性，而一些拥有更具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常常抨击高等教育是精英机构，与主流社会脱节。一些对高等教育的保守批评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全球范围也越来越普遍。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知道，许多针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但这些批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表明，整个领域未能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和实践上的影响。

影响的障碍

高等教育研究产出与实际影响之间缺乏对接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研究者面临多个优先事项，这限制了他们将研究转化为政策和实践的时间。那些拥有学术合同的人必须优先考虑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不是从事更具影响力的实践，比如担任顾问角色或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那些希望从其他学科分析高等教育的人

还面临额外的出版压力，因为他们不仅要在自己所在领域发表文章，还要在高等教育文献中发表。许多人还承担着重要的教学和服务责任，这对高等教育的实践至关重要，但也限制了他们投入更多时间从事面向公众的工作。

激励机制也制约了新视角的发展，显著限制了该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潜力的实现。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变化，现有的概念和理论必须随之演变，并在广泛的背景下得到应用和检验；必要时，还应开发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替代现有的理论。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激励机制并不优先考虑概念性研究。那些最有可能提供新视角的研究者——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在这些地区，高等教育研究相对较新）——往往也是最缺乏时间或资源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新理论的开发。因为他们通常在快速普及的教育系统中承担大量教学和服务工作。

此外，减少新视角可见性的障碍也非常显著。那些使用非英语语言的学者，由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期刊都以英语出版，他们很难接触到国际观众。尽管技术本应促进民主化，但它通常扮演着有害角色。搜索引擎中的算法会将研究者引导至被引用最多的来源，而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则形成学术回音壁，使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更难发现和接触到他们现有网络之外的研究成果。人工智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研究上的视野狭隘，限制政策制定者可以接触到的观点范围，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基于先前发布的信息数据库。

合作的必要性

当代对高等教育的反弹，或许正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社区亟需的呼声。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了解高等教育——包括它的潜在好处和显著的失败——这一点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如果这些知识主要局限于学术回音壁中，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不可见，那么这一机会就会被浪费。缺失的是联系（无论是不同背景之间，还是个体研究者之间、数据集之间，甚至是不同知识和理解方式之间）和转化（既包括语言间的翻译转化，也包括从学术话语到通俗易懂语言的转化）。挑战在于，原本可以促进联系和合作的空间，如会议、学术期刊和研究中心，往往也在延续上述许多挑战，而没有利用其权力地位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组织高等教育领域聚会的研究中心和学术协会在应对当前困境时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可以做得更多，帮助将不同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汇聚在一起，搭建高等教育研究社区与政策、实践领域之间的桥梁。学术期刊、出版商以及其他“知识生产者”也应承担更多责任，优先考虑智力多样性，并致力于开放传播知识。治理学术工作负担的机构也应发挥作用，鼓励研究者促进内外领域之间的联系。同时，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应积极行动，主动与来自不同地理背景的学术领域进行互动。虽然这些行动的实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尤其是在一些不太成熟的机构和影响力较小的背景下，但它们并非不可能，且潜在回报极为丰厚。事实上，除非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成熟潜力将无法实现，且面临的危机将继续存在，最终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不利影响。

注：本文的灵感来源于 2023 年 6 月首届波士

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双年会（*CIHE Biennial Conference*）议闭幕环节的讨论。

高等教育研究与现实：需要更好的结合

查强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qzha@edu.yorku.ca

高等教育研究与现实之间当前存在差距，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通过两个基本的观察来理解如何改变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该领域缺乏具有远见的想象力

这一观点主要源于两个观察。首先，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具有远见的研究，无法指引或重新塑造高等教育及其运作方式。事实上，当前的一些高等教育实践已经超越了研究议程。例如，一些旨在改变传统大学教育组织和交付模式的激动人心的实验正由若干机构或倡议主导，如米内瓦大学 (Minerva University)、奇点大学 (Singularity University)、伦敦跨学科学院 (London Interdisciplinary School)、奥林工程学院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以及斯坦福 2025 (Stanford 2025, 即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内外小组发起的项目，探索斯坦福大学的未来，虽然不属于正式的教育研究领域)。这些举措旨在为学生提供未来社会和生活所需的核心能力，使他们能够利用知识增强韧性、应对不确定性，并通过多学科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

可以说，这些机构和倡议（虽然数量或规模尚小）关乎未来高等教育的模式，以及为从事尚未创造的行业和解决尚未明确的问题而培养学生。归根结底，大学的使命是通

过想象力获取知识，并将这种想象的力量最终转化为人力资源（正如怀特海所设想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和倡议的出现背景是，大学正面临着普遍的怀疑态度，即使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先进系统中也不例外。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56%的美国人认为大学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一比例较 2013 年的 40% 有所上升。这种怀疑情绪在 18-34 岁的人群（大学教育的主要相关群体）和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尤为强烈。毫不奇怪，PBS 新闻最近报道指出，2015 年到 2023 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从 2000 万下降到约 1500 万。无疑，这种怀疑情绪在其他国家也有所体现，新的“常态”表明，未来高等教育将面临深刻变化的需求。虽然上述机构和倡议在推动这些变化方面处于前沿，但它们通常未被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所关注，更不用说由研究成果来引导它们的发展了。

富有想象力的研究需要创新和进步理论的引导，然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从未以产生原创理论而闻名。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应用的大多数理论都来自其他领域，包括组织研究、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甚至科学等。常用的理论框架，如（新）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功

能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批判理论等，基本上都源自这些领域。当我们研究现实世界中存在已久的现象时，通常会将其与其他领域的某些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借用该领域已建立的理论。然而，当我们试图在某一领域想象超越现实的东西时，从该领域的基本宏大理论出发，才是更具启发性和真实性的做法。这实际上接近于“第一性原理”思维，即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从事物知道的第一基础”。

该领域在捕捉实际的实践方面的不足

第二个观察是，高等教育研究似乎越来越无法捕捉到实际的实践，这种情况可以归因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整体性倾向与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碎片化之间的差异。麦克法兰（Bruce Macfarlane）使用“高等教育研究群岛”的隐喻，揭示了该领域中基于政策的研究者与以教学/学习为导向的研究者之间的粗略分裂（研究者和研究通常被聚集在“教学与学习”、“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学生体验”、“财务与行政”、“职业发展”等“岛屿”上）。他还用“断裂的海洋”这一比喻，说明新一代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如何将这一领域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疏远。我们不能忘记，从这些基础学科中，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雷·兰德（Ray Land）、马丁·特罗（Martin Trwo，社会学）、亚历山大·阿斯汀（Alexander Astin）、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戴维·布德（David Boud）、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威尔伯特·麦基奇（Wilbert Mckeachie）、罗伯特·佩斯（Rober Pace，心理学）、罗伯特·伯达尔（Robert Berdahl）、罗杰·盖吉尔（Robert

Geiger）、盖·尼夫（Guy Neave）、谢尔顿·罗斯布拉特（Sheldon Rothblatt，历史）、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经济学）、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哲学）、托尼·比彻（Tony Becher，人类学）、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法学）、厄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科学/听力学）等，举几位例子。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高等教育实践正朝着更加整合和整体化的现实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果越来越多地通过整体化的方法来保障。与此相反，在研究领域，机构研究人员通常未将他们的数据分析与改善学生体验联系起来，政策研究人员常常忽视人类认知发展，教学与学习专家往往对学术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少。

鉴于这一情况，高等教育研究的碎片化已演变为研究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自然导致在试图捕捉复杂问题时遇到困难，例如上述民调揭示的对高等教育日益增加的怀疑和不信任，更不用说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了。在这方面，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是，一位中国某知名大学的前校长公开表示，在遇到问题时，他不会咨询高等教育专家，而是转向某些基础学科的学者。如今，随着人工智能（AI）的崛起，高等教育研究者将很快面临职业危机，因为人工智能在碎片化研究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出色，而这种研究通常涉及文献、信息和数据，这些内容通常局限于明确且有限的领域。

结语

总之，理论原创性和创新的不足导致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在重新构想未来高等教育时的瓶颈。这一领域碎片化和孤立的研究现状导致未能充分捕捉到高等教育实践的现

实，而这些实践日益需要整体性的努力和方法。这使得该领域落后于时代，无法重新调整其实践。未来，这一领域应首先认识到自身原创性的缺陷，然后通过创新寻找出路。例如，由于该领域在专业培训和准备方面的门槛较低，它不应追求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而应打开其边界，努力确立跨学科性

作为其身份，甚至将其作为座右铭。应邀请并鼓励来自不同学术和社会背景的学者与实践者汇聚各自的视角、观点和经验。所有这都可以帮助确保该研究领域与高等教育世界重新对接，而高等教育世界现在正越来越采用整体化的知识组织和传播方式。

黯淡但不无希望：在多重危机中的黎巴嫩高等教育

本杰明·施梅林

本杰明·施梅林 (Benjamin Schmaling)：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DAAD) 安曼分部区域主任

电子邮件：schmaeling@daad.de

黎巴嫩正经历着“现代历史上最具破坏性、多方面的危机”（世界银行，2022 年 11 月）。截至 2023 年夏季，黎巴嫩镑贬值了 98%，大幅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失业率急剧上升，15 至 24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接近 50%。这场危机起源于 1990 年代内战后的经济政策，并于 2019 年 10 月达到了临界点，当时因对通信服务征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自那时以来，由于随后的冲击，形势不断恶化，包括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衰退以及 2020 年 8 月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此外，持续的政治僵局，黎巴嫩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没有总统，临时政府权力有限，这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复苏。这些危机对黎巴嫩社会的累积影响是多方面且毁灭性的，目前约 9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学生面临巨大的入学和负担问题，研究缺乏资助，工资大幅缩水。高等院校在日常运营中陷入困境，由于前所未有的人才流失，教学质量也遭遇了大幅下降。

货币贬值影响教职工、学生和高等院校

黎巴嫩所有大学的学术和行政人员都因货币大幅贬值而遭受了工资的巨大损失。虽然像贝鲁特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和黎巴嫩美国大学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这样受国际支持的院校，迄今为止还能够将 30% 的薪水以美元支付，其余部分以黎巴嫩镑支付，但财力较弱的大学的薪水已经大幅下降。黎巴嫩大学 (Lebanese University)，作为该国唯一的公立大学，薪水完全以黎巴嫩镑支付，减薪幅度尤为严重。因此，各院校的教职工把他们的工作比作志愿工作，并且出现了支付严重延迟以及为额外未支付的工作进行讨价还价的情况。结果，原本的教职工中有多达 50% 离开了他们的院校，前往国外工作。这一切对教学质量和科研产出的影响深远，更加加剧了黎巴嫩依赖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的艰难经济状况。

为了应对预算减少，私立大学提高了学费，通常要求部分以美元、部分以黎巴嫩镑支付。由于学生及其家庭已经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些涨幅使得许多人无法继续或甚至开始学业。绝大多数学生被迫在学习之余打工。即使在黎巴嫩大学，尽管学费以黎巴嫩镑上涨，每年涨幅约在 15 到 60 美元之间，但许多学生也不得不辍学。交通费、互联网、硬件、学习材料甚至文具的费用，给学生带来了额外的可达性挑战，更不用说与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相关的心理压力、不安和绝望感。

黎巴嫩大学的表现和应对挑战的努力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黎巴嫩的几所大学在全球排名中仍然表现优异，如 QS 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例如，在 202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黎巴嫩的 30 所大学中有 8 所进入全球 1000 强，其中包括贝鲁特美国大学、黎巴嫩大学、圣约瑟夫大学（Saint Joseph University）、圣神大学（Holy Spirit University）、黎巴嫩美国大学和贝鲁特阿拉伯大学（Beirut Arab University）。许多院校继续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使它们能够保持联系，并可能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资金或物资支持的机会。

此外，学术机构展示了其应对多重危机的能力，并积极应对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例如，几所黎巴嫩大学建立或扩展了创新中心，支持创业项目。通过培训、训练营、竞赛和资助，鼓励学生实施商业创意，并推销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举措旨在减缓人才外流，并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其他一些院校与国际企业，如电信巨头诺基亚或法国航运公司 CMA CGM，建立了合作关系，提供奖学金、就业机会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支持。

一些大学计划在该地区设立分校，借助本校及黎巴嫩教育声誉，努力开拓新市场并扩大收入来源。贝鲁特美国大学在塞浦路斯帕福斯市建立了分校（AUB Mediterraneo），提供七个本科和硕士项目，计划于 2023 年秋季开始。巴拉曼德大学（University of Balamand）也在与兰开夏大学塞浦路斯分校（University of Lancashire Cyprus）合作的基础上，专注于医学项目，进行类似的努力。黎巴嫩美国大学计划在伊拉克巴格达建立一所分校，包括一所医学院和一座医院。

尽管面临种种限制，黎巴嫩大学展现出显著的韧性。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得益于

来自美国或法国等国家的强大国际支持，包括它们所在国的捐赠基金。但同样，它们在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积累的几十年经验、机构的自主性以及管理层、教职工和学生之间广泛存在的创新精神，帮助它们应对这些挑战。

各种行动者推出改革和行动计划

除了这些个人举措外，黎巴嫩教育与高等教育部启动了一项为期五年的计划，旨在通过加强治理、质量保证和公民参与等关键领域来改革黎巴嫩的高等教育部门。然而，当地专家批评该计划过于笼统，缺乏对当前危机的反映，且在起草过程中未能有效地吸纳实践者的参与。因此，人们对该计划能够解决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期望并不高。其他政策倡议也在努力填补这些空白，其中最显著的是 HOPES-LEB 项目，这是一个由欧盟资助的项目。该项目通过参与式工作坊和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资助、学生支持、教学实践和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的建议，供大学、实施机构、黎巴嫩政府和国际社会参考。

显然，黎巴嫩的整体形势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情况仍然非常严峻。结构性挑战，如有限的政治和国家承诺、缺乏有效的教育政策发展、以及在融资和准入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然而，黎巴嫩学术传统的韧性、其大学的强大声誉、在国际排名中的优异表现以及不断推出的新举措，都证明了希望并未完全消失。也许，这并非巧合，黎巴嫩的国徽上正是凤凰，象征着重生和不朽。黎巴嫩大学作为变革的推动者，扮演着这一复兴中的关键角色，值得获得必要的国家和国际支持。

日本：如何应对人口下降

米泽彰纯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兼副主任

电子邮件: akiyoshi.yonezawa.a4@tohoku.ac.jp

2023 年 7 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人口进一步下降的预测报告，并展示了这一趋势对 2050 年青年人口和高等教育入学的潜在影响。该预测报告突出了以下三个主要特点。首先，人口下降的速度有所加快，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后出生率进一步降低。其次，政府公布了 47 个县の詳細估算，但未考虑到学生可能向东京大都市区集中的情况。最后，该预测首次包含了国际学生的预期人数，但国际学生比例被相对保守地估计在 3%至 8% 之间。

青少年人口的下降对东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几乎所有东亚社会（包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都面临人口低出生率的挑战。东亚地区的经济历来依靠精英研究型大学体系，通过培养具有高度积极性、高素质的学生和劳动力，来维持其全球竞争力。然而，由于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成本高昂，青少年人口的下降可能削弱精英和准精英大学的生源选拔能力，导致课程削减甚至院校关闭，从而引发教育资源过剩和劳动力市场优质人才储备的减少。这一趋势在日本尤为令人担忧。长期的老龄化已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到 2022 年，日本 15 至 65 岁人口与 65 岁以上人口的抚养比例为 2:1，而预计到 2045 年，这一比例将恶化至 3:2，加剧社会经济压力。

学术卓越计划的表现不如人意佳

作者近期对日本过去三十年的高等教育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重点探讨了学术卓越计划的表现不如人意。官方政府报告指出，顶尖大学在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国际化和管理改革取得了稳步进展。然而，政府于 2013 年提出的旨在推广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对科学、技术和创新承诺的象征的举措，未能实现将 10 所日本大学跻身世界前 100 名的目标。截至 2022 年，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s for World Universities），仅有两所日本大学进入前 100 名，而这一数字在 2003 年为五所，2013 年为三所。导致这一短期表现不佳的五个因素包括：

- 大学改革不足，官僚化管理日益加剧。
- 由于预算限制和学费停滞，高等教育经费不足。
- 人口老龄化和本土人才库缩小，加上在增加女性和国际学生入学方面的努力不足。
- 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 国家劳动市场中技能和知识的奖励体系不完善。

这些因素相互关联。例如，国际化进程缓慢受到官僚化、经费不足、人口老龄化以及奖励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同时，青少年人

口下降和人力资源短缺意味着高等教育和国内学生的就业机会竞争减少。老龄化社会往往更加保守，抗拒变革。日本高等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面临着导致衰退或灾难的恶性循环的高风险。关于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影响的最近政策讨论，展示了高等教育、政府和产业各方之间共同的危机感。

改变未来的两个生态系统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尝试发展两个生态系统，以帮助日本社会适应全球知识经济：一个是旨在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生成知识价值的知识生态系统，另一个是旨在培养能够融入全球化人才竞争并激活国家经济的高技能知识工作者的人力资源发展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概念是通过涉及政府、产业、大学和学术界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共同发展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在日本，过去 10 年来，知识生态系统的概念与国家的科技和创新政策紧密相连，得到了广泛的接受，重点关注顶尖大学的研究职能及其与产业的合作。近年来，政府开始强调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全球化和人口下降使得青少年及其家庭之间的多样化和分化加剧。现在，日本政府和社会意识到，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的协调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积极合作。

高等教育再次成为实现这一人才发展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

为了构建知识生态系统，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基于约 700 亿美元债券的国家基金，这比过去 20 年一系列零散的学术卓越计划要大得多。该计划利用这笔基金支持少数顶尖大学（约为两三所）在 25 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学预计将发展自己的捐赠基金，实现财务自主。政府还在支持一系列科研活动，以维持和发展国家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

在人力资源发展生态系统方面，政府现在的目标是将国际学生的数量从 2019 年（新冠疫情）的 30 万增加到 2033 年的 40 万，将日本留学人数从 22 万增加到 50 万。此外，政府还在积极支持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项目的扩展，如信息科学和绿色技术，尤其是吸引更多女性学生。

建设这两个生态系统并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无疑将是一个重大挑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联系需要从新公共管理下短期绩效评估的“委托—代理”关系转变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进行长期对话以实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共同发展。需要改变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建设更具国际开放性、全球公民意识的跨文化社区，这不仅涉及高等教育，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在人口下降的严峻长期压力下，日本没有太多时间。

东亚高等教育：当前与未来的挑战

雨果·奥尔塔

雨果·奥尔塔 (Hugo Horta)：中国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horta@hku.hk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东亚的高等教育系统正逐步进入后大众化阶段。这一新阶段意味着新的挑战、变革和适应新现实的需求，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在这一背景下，东亚面临着三个主要挑战。

在深入探讨这三个挑战之前，必须指出，与其他地区一样，东亚面临的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的挑战，如公平和准入、评估和教育质量等问题，仍然大多未能得到解决。

由于人口变化而整合高等教育系统

东亚地区高等教育部门的扩张期即将结束。该地区的大学可能会通过吸引国际学生来缓解国内学生入学人数的下降。然而，其他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该地区的生活成本和学费可能使东亚的大学很难吸引大量国际学生。这一挑战不仅与东亚的大学相关，还涉及对最终有意进入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的欢迎范式变化。当前的“同化”视角可能需要转变为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让东道国能够利用这些技术移民的新想法和创造性潜力。东亚的大学可能还会寻求为非传统学生开设课程，以满足终身学习的需求。然而，这一策略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首先，非传统学生的课程时长和工资水平通常低于传统学生。其次，在老龄化社会中，人们可能会担心为退休储蓄，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储蓄用于养老金，而不是教育。第三，东亚国家的家庭债务较高，经济

条件不佳（可能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非传统学生不太可能动用其可支配收入或财富来投资教育。

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学生都在私立大学就读，而私立大学面临着最大程度的关闭风险。私立大学的财政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费收入。它们通常以教学为主，声誉较差，且不如公立大学有名。随着入学人数下降，私立大学很可能会关闭或合并，以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公立大学由于得到政府资助并拥有使其在经济和社会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应该更加安全，即使它们不一定具备财务可持续性。然而，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免于合并的命运，因为该地区的政府债务也较高，公立预算将需要对支出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都将面临裁员，导致学者失业的预期，一些学者可能在该行业中难以找到工作（年龄限制），而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则会面临在学术界找到工作的困难。

高等教育系统须为技术经济变革做好准备

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及相关的大规模自动化将要求大学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内容。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技术变革和进步的具体结果，但未来的工人预计将在其一生中从事多份工作。传统的“学习工程学

以成为工程师”的路径已不再适用，因为一个学习了工程学的学生，毕业后可能会成为经理、教师或从事与工程学无关的职位。学生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适应性技能，因此，学习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学习、如何放弃不再适用的知识以及如何重新学习上。学生应能够适应新挑战，而不是过于专注于学习可能迅速过时的专业技术知识。大学应考虑教授学生跨领域的技术知识，以及如何适应多元化工作要求和多重挑战的能力。增加多学科项目学习和体验式学习至关重要。因此，课程可能需要由多个学院或部门共同开设。这一变革必须在整个教育系统内推广和实施。然而，大学应当是首先为这些变化做好准备的机构，认证和评估机构也应当采取相应的准备措施，因为技术的不确定性要求不仅学术界，还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不断重新思考和保持灵活性。这将需要广泛的努力，而这一努力只能通过推动更多机构和项目多样性，以及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的自主性来实现。

为了确保大学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大学应当促进并投资于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分散有限的资源试图做所有事情，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最终未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还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这意味着需要缓解研究、教学和服务之间的持续张力，并改变目前学术界在晋升和激励体系中面临的困境。研究型学者的职业生涯，最初是依据他们的研究潜力/研究背景招募的，应通过与研究质量和研究生培训相关的

活动来评估。教学型学者，最初是根据他们的教学能力/潜力招聘而来，应首先依据他们开发的创新课程、对学生学习的密切监控以及教学与教育学的研究来进行评估。所有学者都应能够从助理教授晋升为教授，但评估标准应依据其核心优势以及与其所聘职位相关的工作进行相应的评估。

深入和可持续地国际化

尽管东亚大学的学者发表的国际学术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但其可见度和影响力仍然有限，这将继续投资于科学和学术研究。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相比，东亚地区的公共学术投资仍然较低，且这一水平至少应保持现状。这也证明了该地区学术人员国际化的必要性（不仅要促进国际流动性，还要吸引更多国际学者、博士后研究员和博士生来东亚大学）。此外，研究产出需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这种关注产出的倾向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激励措施强调发表数量而非质量，这种情况亟待改变。为了提升社会福祉，开展旨在满足全球大学排名配额的研究应当被富有意义的研究所取代。向质量转型可能意味着需要在 STEM 以外的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进行更平衡的投资，因为这些领域是二十一世纪创新和突破的核心。

注：本文基于作者撰写的文章，请见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aepr.12416>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 琪

编辑：吴 燕

翻译：陈若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Translator: Ruoxi Chen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